

浅述大中华地理志的编修*

谢皆刚

提 要：1916年6月，中国地学会为肃清帝制独裁的逆流，宣扬共和观念，增进国民智识，联合中华书局，倡议编修集国家、省、县于一体合计达3000册的大中华地理志。奈何旋即国会解散，中华书局撤资，幸赖林传甲全力支持，方得以继续，并成为此一时期中国地学会最大的事业与成就。1922年1月，林传甲在完成《大中华吉林省地理志》后病逝，系于一人之身的大中华地理志编修事业亦戛然而止。

关键词：中国地学会 大中华地理志 林传甲

合群修书是专门学会的主要功能与事业之一，中国地学会在创建时即将此条列入章程。然而，缘于学会内外种种因素，一时未能付诸实施。1916年6月，袁世凯病逝，黎元洪接任总统，有意恢复法统。中国地学会会员中多有国会议员、又倾向民党的中国地学会重燃参政议政的热情，借助学理与学会组织干预时事。

为肃清帝制独裁的逆流，宣扬共和观念，增进国民智识，中国地学会利用学会的研究与组织特长，联合中华书局，动员国会议员与各界人士，分撰集国家、省、县于一体合计达3000册的大中华地理志。此前学界对此关注较少，以《地学杂志》为主辅以相关资料，勾勒中国地学会编修大中华地理志的主要脉络，探究其言行的表意与本意，或能推动相关研究的进展。

一 渊源与倡议

1915年12月12日，袁世凯称帝。“各省反袁者日多”，国民党议员“多秘密来约”曾为众议院议员的中国地学会会长张相文南下。因“袁氏侦探密布车站，防阻敌党离京”，1916年4月张相文文化装成老农，“将须染黑，戴笠骑驴，出永定门至丰台，买票上车抵津。抵沪后，寓青年会，以卖卜度日，假名张半仙。革命党来寓商协国政者，踵相接也”^①。风波所及，中国地学会在编辑出版第7年（1916）第3期《地学杂志》后停止活动。

1916年6月6日，袁世凯去世。黎元洪继任总统后，有意恢复法统，约法与国会成为时人关注的两大议题。国民党对国会寄予厚望，认为中国“前途之一线光明但在国会”^②，因此张相文随在沪国会议员回京预备开会，并续办中国地学会。7月16日，《民国日报》称重建受袁世凯专制压制的有价值集会，唤起言论界的生机，有助民气的恢复。^③18日，又报道内务总长许世英在国务会议上提议修改报律，“拟减少保证金，及撤销检察新闻之制”^④。加上与张相文甚有渊源的范源濂出任教育部总长，中国地学会评议员袁希涛为次长，以教育部及农商部的补助为主要经费来源的中国地学会，迎来难得的发展良机，事业迅速恢复。

*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“地学会研究（1909—1924）”（项目编号：16FZS044）阶段性成果。

① 张星娘：《泗阳张沌谷居士年谱》，张相文著：《南园丛稿》（五），沈云龙主编：“近代中国史料丛刊”，文海出版社，1968年，第300册，第2421页。

② 《国会与政府》，《民国日报》1916年7月4日，第2版。

③ 参见《时评》，《民国日报》1916年7月16日，第7版。

④ 《议修改新报律》，《民国日报》1916年7月18日，第7版。

学校开设乡土地理课程，源于近代西方，进入中国学堂则始于戊戌时期。1902年，张相文在《初等地理教科书》一书中指出：“地理教授之始，不外分解、综合二法。童子初学，宜依综合合法教以乡土志，就目前所见，随处指点使其易于领会。”^①次年，《奏定学堂章程》明确规定，初等小学“尤当先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，以养成其爱乡土之心”^②，进而至于爱国。

1905年，立停科举后学堂大兴，加上地方自治主义兴起，乡土地理的编修出现一个小高峰。有人统计，1905—1911年总计约有463种。^③其中，国学保存会编纂的乡土地理志，宗旨明确，体例统一，成绩较大。他们自称：“盖吾国各省通志失修者久，本会所编虽根据旧志，而参考之书多至数百种。复证明现今大势，凡地理、历史上与时局有关系者，无不提要钩玄，读者一览而全省之大势了如指掌，悠然生其爱乡土爱国之心，合各省读之而全国大势无不了如指掌矣。”^④

1912年，教育部指出，“近因民国更新从前教科书多不适用，而新出版尚属寥寥”^⑤。3月16日，舆论宣称，“历史、地理之教科书宜从各地方之乡土史先为编辑”^⑥，以树立学生的世界观，及保种、爱国之心。4月20日，中国地学会总干事长章鸿钊发表《地学会应行事务之商榷》称，“我国教科未备，讲授为难”^⑦，应合群编辑裨益教育。同时，中国地学会宣称学会宗旨之一在搜集地理书籍，以备研究。学者谓“解放前国内收藏志书最多的是北京图书馆”，此外徐家汇藏书楼、南京国学图书馆、中国地学会等也有收藏。^⑧丰富的藏书特别是地方志，为中国地学会修志提供了方便。

二次革命后，北京政府统治渐趋稳定。各级政府与教育机关，屡征乡土志，“于是，疆吏檄各郡守、县令编辑《乡土志》以进，化一格式、考订，而为学校课程焉”^⑨，种种需求使乡土志的编修再次兴盛起来。各地呈送的乡土志中，不乏为复上命、临时编造的粗制滥造之作。如1913年吉林民政长“令各县送乡土志”，双山知县牛尔裕“又不敢无以复命，爰于风晨雪夜，据事直书”^⑩，仓促草就《双山县乡土志》，以复上命。

1915年1月20日，《地学杂志》刊登姚明辉《句容乡土地理序》。姚明辉是与张相文并称为“南姚北张”的新学地理名家，其以古代中国的方志附会乡土地理教科书称，“予考古地理书，往往重乡土”，若《吴郡记》《吴地记》等“皆乡土之类也”。为构建中国乡土地理的谱系，姚曲解《周官》云：“《周官》云：土训掌地图以辨事物，诵训掌方志以知地俗。其书与志，后世不可见。要以辨地物知地俗，经文固明示矣。王制言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，又言广谷大川异制，民生其间者异俗，乡土地理盖重此也。”又认为，隋仅《隋书·经籍志》“所载乡土书，盖

① 张相文：《初等地理教科书》，“凡例”，南洋公学师范院编译，南洋公学1902年第2次石印。

② 《奏定学堂章程》，张百熙撰、谭承耕、李如龙校点：《张百熙集》，《湘湖文库》甲编，岳麓书社，2008年，第290册，第145页。

③ 参见巴兆祥：《论近代乡土志的几个问题》，《安徽史学》2006年第6期。

④ 《各省乡土志第二册续出》，《国学保存会报告》第10号，《国粹学报》（分类合订本）第3年第8册。

⑤ 《通告各书局登载本部审定教科书广告不得就原批意为删节文》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：《北洋政府档案》，中国档案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89册，第75页。

⑥ 《无锡侯鸿鉴对于临时教育之意见》，《申报》1912年3月16日，第7版。

⑦ 章鸿钊：《地学会应行事务之商榷》，《地学杂志》1912年第3、4合期，1912年4月20日。

⑧ 参见林衍经：《方志学综论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113页。

⑨ 谈国：《（民国）辑安县乡土志序一》，柳成栋、宋抵编：《东北方志序跋辑录》，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387页。

⑩ 牛尔裕：《（民国）双山县乡土志序》，柳成栋、宋抵编：《东北方志序跋辑录》，第339页。

三十余种”。宋元以后，“侈谈文献，州县之志踵事增华，博而寡要，非古法也”。至于乡土地理的功效，姚明辉声称正如“孟子云：乡田同井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，则百姓亲睦”，故姚明辉近10年辗转在金陵、武昌等地师范学校教授地理，主张乡土教学，“所至提倡之”^①。此外，姚又自著《高等小学地理书》作为模范，要求师范学生模仿撰写乡土地理志，共得500余种。

1915年12月25日，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，发起讨袁护国运动，各地群起响应。察哈尔长官怀疑蒙古教育协会会长林传甲“将举两翼诸生，以响应滇黔，爰避地天津”。林传甲入北京，驻中国地学会，谋利用其收藏的志书，以及人脉合群编修全国性的乡土志。其与张相文商议后，发起编辑大中华地理志的倡议，寄望“苟天不亡我中华”，在10年之内必撰成，“庶几全国地理，有所参考”^②。

1916年6月25日，《地学杂志》公布林传甲《大中华地理志序例》，倡议由中华书局出资，以中国地学会为编辑机关合群修志。其称现在中华“尚无一完全地理志”，是国民的责任，也是中华书局的责任。“在昔易姓受命”，必集全国之力编修各级志书。然世易时移以共和眼光视之，“其散涣支离，漫无统纪，不足以供参考之用”。现在各省设立通志局编修通志，但成书尚需时日，且“恐又成官样文章”，故联合中华全国地理专家编修志书，分为甲编全国志；乙编省、区志；丙编道志；丁编县志；戊编“志各埠、各名胜、各要塞、各铁道”，“创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巨制，分之三千册，各自为书，合之则名曰大中华地理志”。

例言声称大中华地理志模仿《中华地理全志》，各册可分可合，分是为了方便在本省、本道、本县的分销，合则可作为各图书馆各学校的参考，“洵为中华空前之著作”。其中，甲编为全国志，当在北京编辑，“以中国地学会为编辑机关，京师大学校地理教员为主任”，内政、外交、海陆军、财政、司法、教育、事业、交通、蒙藏等“皆据各部院最近调查”。乙编的京兆志、丁编的大兴县志、戊编的北京城志，亦在北京编辑，作为各省、各县的模范。其余志书，“由各省、各县学校地理教员，或通志局员，自行编辑，或私人著述，均可自为一书”。各册“均由上海中华书局悬赏征集”，编辑费用甲等每千字6元、乙等5元、丙等4元、丁等3元，版权属于中华书局。各册题名皆为大中华地理志“某编、某省或某道、某县”，分之以植地方自治的基础，合之“可收统一之效”。全编共计约3000册，每册至少需要花费500元，总计约150万元，预计销售总额为200万元，可赢利50万元。“然编辑尚需岁月，始能陆续出售”，以10年计算，每年需要经费15万元。修成各书由中华书局在各地的分店销售，预计“大县可销万册，小县亦可销千册。甲编必遍销全国，以百万计，乙编必遍销于本省，以十万计”。林传甲又邀请各编辑入股，并代为劝股，声称若每县能招10股，“兹编即完全印成，并非难事”。最后林传甲展望说，“传甲慕全国之人才，量全国之财力，必能办到，预算计画，非夸辞也”^③。

大中华地理志的编纂模范，是中华书局1914年9月出版的由孔廷彰等编译的地理教科书《中华地理全志》。是书“以日人西山荣次《支那大地志》为蓝本，参以英、法人著作及最近调查”。卷首为绪论，其后依次是本部各省志、东三省志、蒙古志、新疆省志、西藏及青海志，各志分总说、地文地理、人文地理、地方志4项。是书的特色有：“（一）详备，全书八百余页，

① 姚明辉：《句容乡土地理序》，《地学杂志》1915年第1期，1915年1月20日。

② 参见林传甲、连德纯：《大中华易县地理志》，《地学杂志》1918年第4、5合期，1918年5月25日。

③ 林传甲：《大中华地理志序例》，《地学杂志》1916年第4、5合期，1916年6月25日。

约四十万言；(二)注重现势，与仅重沿革者有别；(三)注重边地，于满蒙藏尤详；(四)调查新确，皆择最近调查较为可信者；(五)末附内务部新颁道县名称表^①。”

1916年7月25日，《地学杂志》刊登林传甲《察哈尔乡土志序言》。序言称环球各国以德国地理学最为发达，“其教科书最切实用者，则为乡土志”。中国在甲午、庚子后，“始发愤兴学”，然地理教科书多为译印，“遂空谈五洲、万国，而不知本省、本县之地理”，故林传甲主张地理学的应用“宜自乡土志始”。林传甲在察哈尔讲学时观其“旧无专志”，然“余不搜辑故纸，而喜从事于新调查”^②，所以亲自游历调查外，又发动学生利用假期调查，汇辑而成是书。据此，大致可知林传甲编纂乡土志的宗旨与方法。

二 体例与方法

大中华地理志多达3000册，又是众手修书，为统一体例，林传甲撰写《拟编大中华地理志各省各县分纂纲要》称，中国地学会编辑大中华地理志的倡议，已经得到国会各省议员“多数同意”。原拟编修的道志，因议员公议不若取消，本会亦以为无需保留，故予以取消。招股之事，因为中华书局附股，将由200万增加到300万股，“合中华全国各省之人才财力，以经营此役”。最后再次申明，期望大中华地理志各册，“分之则为地方之自治，合之则为五族之共和”之用，以达到“无人不学，无人不明地理，无人不爱国家，其几已见于国会议员加入中国地学会为始”。

各册志书分为：一绪论，即缘起；二位置，以实测的经纬度确定方位，其中经线以北京为中线；三地文，分区域、地势、海岸、山脉、河流、湖泽、沙漠、井泉、地质、气候、物产；四人文，有人民的种族、言语、衣服、饮食等，以及政治、官制、警察、军政、旗营等，“并附沿革一篇，胪举历代改革大端”；五地方，省志宜说明某县原属某府道，县志则记载自治区域、警区、学区与重要的乡镇，“其他村落可择要列表”；六附属，记载各省区兼管的旧藩属，各县兼管的土司，“或邻近外国属地，外国租地，原属我国者，亦必详记之”；七插图，卷首地图一张，卷内附照片；八字数及装帧，依照《中华地理全志》每行33字，每半页13行共计429字。“省志洋装一大册，依中学地理教科书字数；县志洋装一中册，依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字数”^③。确定大中华地理志的体例后，中国地学会会员、国会议员、北大学生等主持编修，第一批承诺的有会员10余县志，国会议员9省志、8县志，北大同学会共5省、县志。

1916年12月25日，《地学杂志》刊载刘延祺《吉林乡土志略》^④称，“凡一代之礼乐冠裳、人物山川，以及风俗土产，必观于志而后详。后世扩而充之，不仅于一代之史，始有志也。各省多有通志，一府州县则有一府州县之志”。志可以补正史的不足，“为参考之资料焉”。刘延祺因居住吉林省城，无暇游历考察，故“谨以所知，略记数则”，以备方家。林传甲《易县入京纪程》主张乡土志是史学，可以补正史的不足。其谓任教易县，每月往返8次，借铁路的便利，得以考察近畿一带的山川、形胜、人民、风俗及政治、教育，作此文“以示诸生为游学之导而

① 《中华地理全志》，《申报》1914年11月1日，第1版。

② 林传甲：《察哈尔乡土志序言》，《地学杂志》1916年第6、7合期，1916年7月25日。

③ 参见林传甲：《拟编大中华地理志各省各县分纂纲要》，《地学杂志》1916年第6、7期，1916年7月25日。

④ 刘延祺：《吉林乡土志略》，《地学杂志》1916年第12期，1916年12月25日。

已”^①。在其示范下，易县“中学诸生有地理著述者已十余家”^②。

1917年年初，林传甲以蒙古教育会会长的名义致信中国地学会称：上年发出编修大中华地理志的倡议后，各省区同人次第赞成，以贵会为总机关，在各省、各区、各县设编辑支部。但中国省、县数量众多，“或难一致进行”。今为编辑察哈尔的张北、独石、多伦、丰镇、凉镇、兴和、陶林7县志，蒙古教育会推举察哈尔中学校长吴天澈、察哈尔师范教员钱拭时主持，又将中学、师范学校学生分为7部分，分任7县志的调查、编辑，预期在一年内均可成书。此种编辑办法切实可行，现请贵会在《地学杂志》刊登倡议，“凡有中学、师范学校之处，即希各同志分团仿办，既可助诸生自助之力。一切例假之时，诸生回籍，尤能实地调查，不糜费而事举”^③。

中国地学会以林传甲为大中华地理志总纂，编辑部长章崧、刘仲仁先后主持其事。根据《地学杂志》刊发的承修大中华地理志名单，截至1918年5月25日共169人自领大中华地理志省志或县志的编修。因承修者身份有别、学理歧异，张相文与林传甲讨论统一志书体例事，“谓宜举一县为范本”。是时，林传甲任教易县中学，“悟日月为易之旨，学生百余辈，佐助调查，不三月而易县志稿竣”^④，即《大中华易县地理志》。其依据《大中华地理志公纂纲要》将“雨雹水旱应附于气候，地震应附录于地质”，“建置沿革则消其繁”，所附疆域、山川、形胜、关隘等归入自然地理，公署、村社、学校等列于政治地理，“盖地理志注重当时事，不偏于考古纪事”。故内容有位置、人口、村社、警区、地势、山川、水泽、地震、火山、山之层累、黄土之成因、矿产、气候、农产、森林、棉业及染料、动植物、民族、言语、服装、饮食、居住、器用、宗教、家族、节日、教育行政、文化、农工、商实业、公园、交通、电报邮政、沿革、古迹、城镇乡村等项。

大中华地理志以实测、调查相号召，但限于资金及专业人员的匮乏，一时难以实现。《大中华易县地理志》的北极高度依然是康熙四十年（1701）测量的旧数据。该志声称因为英国是世界强国，政治文明、学术发达，中国译西人地图时多以英国伦敦为经线的中线。但在中国内地“断无用他国经度之理”^⑤，故经线以北京为中线，以别内外。林又称书成后刊布在《地学杂志》，请承诺编辑的同志指正，重新修订后刊为定本作为模范。^⑥

1918年5月25日，林传甲在连载的最后一期《大中华易县地理志》称，上年倡议修志以来，“合诸同志暨诸生之力，阅一年而成此编”，是为大中华地理志1818册县志中的第1册。同志期以10年之功，撰成大中华地理志，各界同志承诺编修的已达400余县。其余各志书，“余与诸生继此而力图之，必力底于成，但须积日累月而无懈耳”。学生亦对著述感兴趣，“即助我为大中华地理志者，亦十有六县，他日相见，各出新著作以商榷焉”。又期望《大中华易县地理志》“亦吾国文明种子乎”，而余“投笔而起，又岂徒以文章报国欤”^⑦。其寄望远大，然观易县志，载籍稀见，新理亦少，作为小学教科书尚可，距离报国的期望则甚远。

民国以来，旧志不合于共和时代，亟宜变更体例已经成为各方共识。1918年1月25日，

① 林传甲：《易县入京纪程》，《地学杂志》1917年第1期，1917年1月25日。

② 林传甲：《介绍图书：国文浅训》，《地学杂志》1917年第1期，1917年1月25日。

③ 参见林传甲：《蒙古教育研究会来函》，《地学杂志》1917年第2期，1917年2月25日。

④ 林传甲：《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自序》，林传甲：《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》，浙江印刷公司，1918年。

⑤ 林传甲、连德纯：《大中华易县地理志》，《地学杂志》1917年第5期，1917年5月25日。

⑥ 参见林传甲：《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自序》，林传甲：《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》。

⑦ 林传甲、连德纯：《大中华易县地理志》，《地学杂志》1918年第4、5合期，1918年5月25日。

《地学杂志》刊登胡朴安《拟续修福建通志体例》^①称,“修志等于修史,首重体例。体例不严,成书寡色”,故发凡起例为修志之首要。“惟时世变易,守古既嫌拘泥,创例或乖大雅”,勉成其事就“深于史学者教正之”。至于志书体例变更的原因,一因“志所以纪社会之生活及状态,旧志之眼光不同,则详略取舍根本差别,不能不另事更张者”;二因今日事物,旧志门类不能包括,故不能不新辟门类。改定体例“必求适乎今而不戾乎古,方为善美”,因此福建通志拟设图、表、纪、传、附录各项。

其时,各大学的史地学科,提倡利用假期返乡调查,编修志书。中国地学会会员在北大、北京高师等学校任教的甚多,他们利用教学之便,鼓励学生调查乡土地理,并推荐到《地学杂志》发表。1918年3月25日,北大史学门晁俊昌《泌阳县地理沿革与地文概况》^②在《地学杂志》发表,认为“自禹画土分州,为吾国地理学祖。周外史掌四方之志,而地理加详焉”。至今“若能审山川之形势,地质之所宜,补其缺而助其长,中国之富强,何待他求焉”。同期刊登的还有北大史学门邹树椿《蓬莱县地理沿革与地文之概况》,详述蓬莱的沿革、疆域、区划、山川、地势、城池、古迹、武备、海防、气候以及物产等项。

5月25日,《地学杂志》载北京高师学生阚国宾《铁岭县地理志要》^③称,中国的行政区划分为省、道、县,“积县而成道,积道而成省,积省而成国,国者县之积也。因此考地理,必自县始”。中国旧有的地志,详于国略于省、道,“而县则缺焉,窃以为未尽善也。夫山川城壑,随地呈奇,铁壁铜关,何地不具。百里而风俗殊,各县而政教异”,因此编修志书应以县为准。然全国共1800余县,详细调查不易,“即各县均有详志,而汗牛充栋,亦无可钻研”。希望各县的学子,汇集本县形势、事迹关系全国、本省者,“萃为数章,以贡益我国地学界,较之翻阅经史,穷年伊唔咕啐于故纸堆中,差为有益”。国宾本此意,编修铁岭县志,“以供研究地理诸同仁之参考”。阚国宾要摈弃故纸,据游历调查编修志书。同期杂志刊登的邓之诚《省志今例发凡》^④,述作省志的缘起与体例,则因多于创。邓指出“夫良史之作,惟取证于古。方志之书,则兼详于今”。中国旧学“每踏空虚”,“自顷改革以还,旧志待续者恒数十年或百余年”。现在编修志书当与旧志不同,一在国体变,禁忌破;二在西儒专精地理,“造端宏远,类次相从,而一归实用”,故宜取彼成规,“略事改创”;三在世易时移“事变日繁,必宜增辟门类”,重今制。然而方志“袭取西裁,务求简便。或滥竽陈章,制言不典,则亦非所取”,所以“图、表、志、传之体,千古不废。惟增创通纪一类”。二人主创造与主因袭的不同取径,根源在前者认志书是地理,应详于今;后者认志书为史,须考古为主兼记现今。

三 编修与终止

大中华地理志的编纂原拟以议员为主,1917年6月13日张勋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,加上中华书局撤资,大中华地理志的编修陷入困境。林传甲对章嵒“谓时不可失,吾辈必当急策其成”^⑤,故“近似橐笔二十二行省”,游踪所及每省编修一志,“三月成一编”,不出10年全国22

① 胡朴安:《拟续修福建通志体例》,《地学杂志》1918年第1期,1918年1月25日。

② 晁俊昌:《泌阳县地理沿革与地文概况》,《地学杂志》1918年第2、3合期,1918年3月25日。

③ 阚国宾:《铁岭县地理志要》,《地学杂志》1918年第4、5合期,1918年5月25日。

④ 邓之诚:《省志今例发凡》,《地学杂志》1918年第4、5合期,1918年5月25日。

⑤ 章嵒:《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序》,林传甲:《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》,第1页。

个行省即可修毕。

缘此，林传甲在完成《大中华易县地理志》后，为修志赴各地调查游历。其在山东“得师范生四百人为助”，于是全省107县的地理志，已经由各师范、中学学生暨劝学所分担无遗。是时，黄隽珊任职安徽省省长，“函招游皖，安徽教育费绌，而师范生研究乡土地理博物者，其勤实亦他省所不及，省教育会请驻会编辑”。不久，又由皖至浙，编修浙江志，不想竟先成《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》。

1918年7月7日，《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》出版，林传甲在自序中指出，“大中华者，中华人之中华也。浙江者，浙江人之浙江也”，中华人必须知中华，推而及各省、各县。且“苟地方皆能自治，斯国家可以共和”，而自治当始于自知，无自知之明，“则学业之根本不立，安望其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乎”^①，故编各省、县大中华地理志以树立地方自治的根基。

张朝墉为《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》作序，指出各省通志卷帙浩繁，初学者难懂且价高难买。若浙江省旧通志120卷，“学子应熟何篇？是以浙人知浙事难矣”。是书删繁就简，洋装一大册，学子“人手一编，舟车称便”。作为专门为中学、师范学生编修的地理教科书，“其文以简括为主，教习便于讲演，学子易于领悟”，待“全国全书告成，了如指掌，中国人无不知中国事也，其为功于教育界，岂浅鲜哉”^②。

中国地学会刊发《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出版广告》^③谓，大中华地理志甲编分省、区、蒙、藏共30册；乙编分县，每县1册计1844册。浙江志按照中学、师范地理教科书的体例编辑，计有总论1章、位置8章、地文地理34章、人文地理42章、地方志75章，共160章，洋装1巨册，售价2元。全书“文简意赅，考据精详，有志研究地学者，洵当人手一编”。

1918年7月10日，《大中华江苏省地理志》出版，林传甲谓江苏志的编修本在浙江志之前，但因游皖编安徽志，江苏志被暂时耽搁，乃与“宝应卢厅长殿虎，在皖商定例目”，“前江苏程都督，复指授山脉地势”，又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等“共研乡土职业之实用”^④，终成此书。10月，林传甲在上海演说，“传甲矢志任大中华地理志总纂，每省编一册以课中学，每县编一册以课小学”^⑤。据此，大中华地理志省志以中学、师范地理教科书为准绳，县志则依据小学地理教科书，中国地学会销售志书获利的信心亦源于此。

1919年年初，《大中华安徽省地理志》杀青，林传甲在《安徽地理志之名义》中谓，民国后安徽始与江苏完全分离，《安徽通志》成书在40余年前，陈旧无用。今据实测、调查、耳闻目见新修志书，“心思之所得，晤商安徽父老兄弟千余辈，问业之所积，论次如后，以备大中华各省志二十二部之一”^⑥。甚至有人声称，安徽志“用资观感，则拜嘉祝正有甚多者，或者吾皖古代文化复兴之机，即以此卜之乎，是又安能不为之誉”^⑦，将其提高到复兴地方文化的高度。

中国地学会在《大中华安徽省地理志》的预约卷广告中称，书成后由本会编辑主任黄昌寿

① 林传甲：《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自序》，林传甲：《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》，第1—2页。

② 张朝墉：《序》，林传甲：《大中华浙江省地理志》，第1页。

③ 《中华浙江省地理志出版广告》，《地学杂志》1918年第7、8合期，1918年8月25日。

④ 林传甲：《大中华江苏省地理志》，“出版说明”，商务印书馆，1918年。

⑤ 《双十节之大祝典》，《申报》1918年10月10日，第10版。

⑥ 林传甲：《安徽地理志之名义》，《地学杂志》1919年第3期，1919年3月25日。

⑦ 刘道章：《大中华安徽省地理志序》，《地学杂志》1919年第3期，1919年3月25日。

校刊,“厚三百六十版”^①,售价2元,预约每份1元,订100册以上者8折。为销售志书,林传甲函请安徽督军倪嗣冲帮助推销到各级学校。倪嗣冲在回信中写道,“皖志一书,良为切要,已由敝处切实函托吕省长饬属多购”^②。安徽省省长吕调元致函林传甲云:“先生主持编辑其事成书,搜乡土之见闻,供教科之参考,热诚毅力,钦佩良深。”预约卷现已“交由教育厅转行所属各校购阅,并饬以后与中国地学会编辑处”^③接洽。另外安徽督军驻省军需处,也购买了100册的预约卷。^④

1919年8月25日,《地学杂志》刊发林翰《大中华福建省地理序》谓,自割让台湾以来,东南藩屏尽撤,日人窥视福建,屡屡派人来闽考察地理、地质。闽人对此漠然置之,“其不能言闽之地理者,恐什九与翰等,譬诸纨绔子弟不自明其财产之数”。林传甲编是书,“在非闽之幸耶”^⑤。同时,中国地学会大中华地理志出版部称,已经修成浙江、江苏、江西、安徽、福建、京师、京兆、湖北8省志。

1920年前后,修改学制的声音渐高。国人呼吁地理教育应当注重乡土教育。陈独秀明确指出,“而地理一科,亦贵简单明了,切合实用,不必好高骛远,采用西籍,或授外国地理,可以本地乡土形势,暨风俗人情,逐渐灌输足矣”^⑥。

中国地学会为了筹资出版《大中华京兆地理志》,致信京兆尹公署,请将京兆志作为各级学校的地理教科书,并赠送《地学杂志》数十册。京兆尹公署回函称接贵会来函及杂志数十册,“备悉贵会热心地学,钦佩良殷,复蒙分纂二十县地志,尤于弊区乡土事有关,兹送上洋百元,用资协助”^⑦。

1920年春,《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》编修完成,林传甲致信时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的中国地学会元老吴鼎昌,请向各级学校推介。4月22日,吴鼎昌回信谓“已将寄件分寄各省立学校暨各县劝学所,嘱其购买矣”,然“现值学潮时代,处置不易得手”^⑧。林传甲又上书大总统徐世昌,“叠蒙赏宝,今年京兆、直隶两志,并蒙颁发省区”。中国地学会以出售直隶志的盈利,编修河南志,作为“纪念国庆之品,敬检呈二百册,上备乙览,并颁发河南各县各校,仰见大总统博采刍蕘之盛”。同人期望通过编修大中华地理志,“竭匹夫绵力,力求天下利病”^⑨。

《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》凡例称,是书依据《河南通志》及各县志,然“必折衷于今日之新制,此外借鉴倭文《支那省别全志》。倭奴不识中华,称为支那,是以各省志,皆称倭奴”。河南志是地理教科书,拟另撰河南乡贤传,以课修身;河南文学史,以课国文;河南列女传,以课女学;河南博物志,以课理科,所以“愿河南鸿硕,分纂河南百科全书”^⑩。

① 《大中华安徽省地理志预约卷广告》,《地学杂志》1919年第3期,1919年3月25日。

② 《来函照登一:倪嗣冲致林传甲》,《地学杂志》1919年第4期,1919年4月25日。

③ 《来函照登二:吕调元致林传甲》,《地学杂志》1919年第4期,1919年4月25日。

④ 参见《来函照登三》,《地学杂志》1919年第4期,1919年4月25日。

⑤ 林翰:《大中华福建省地理序》,《地学杂志》1919年第7、8期,1919年8月25日。

⑥ 《陈独秀演说现今教育之缺点》,《申报》1920年3月30日,第10版。

⑦ 《本会纪事:京兆尹公署》,《地学杂志》1920年第6期,1920年6月25日。

⑧ 《河南教育厅长来函》,林传甲总纂、林传涛分纂:《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》,武学书馆,1920年,第1页。

⑨ 《国庆日上徐大总统进呈新印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书》,林传甲总纂、林传涛分纂:《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》,前附页。

⑩ 林传甲总纂,林传涛分纂:《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》,“凡例”,第1页。

林传甲在自序中写道，四弟林传涛因为赴湖北5次途经河南，“所调查者则汇交中国地学会总纂，是以三易稿而后定”。“倭奴蓄谋河南已久，试观倭文《支那省别全志》，河南省一册，早已刊行，陈列于地学会。今浅见者但知倭人窥伺山东，岂知倭人窥伺河南省，早已藉游历深入我内地也”。1920年春季河南志修成，因缺少印刷费暂时搁置。9月9日，直隶志编修完毕，二书得到“徐大总统资助，乃得付印，于民国九年十月十日国庆日出版”^①。9月，陈宝泉在《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序》中谓直隶志在关于地文地理、人文地理两方面，皆有详尽、精确的调查。对全省119县当时的状况，“亦各备载无遗”。若人手一本，则全省情形了如指掌，“可供学者研究之资，可为乡土教材之本”。行政、实业等也可参考，“以为设施之图谋，则此志裨益所及，岂独学校一方而已哉”^②。10月25日，中国地学会发布《大中华地理志十二编》的广告，计有京师、京兆、直隶、山东、山西、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、湖北、福建、河南12省志。^③

大中华地理志原来计划由中华书局提供资本与销售渠道，版权归其以为回报。中华书局退出后，编辑费用由中国地学会委托林传甲牵头多方筹集。缘此，林呈书内务部申请注册给照，内务部批示：“查著作权法第五条内载数人共同之著作，著作权归各著作人共同终身有之。”^④1921年，林传甲任职吉林，“三阅月”成《大中华吉林省地理志》。其在自序中写道：“编某省志必至某省”，前“在京所编，多据旧籍。来吉始得官书文卷，知在京所据教育部《教育公报》皆数年前状况，其余可推矣”^⑤。翌年1月，林传甲在吉林病逝，系于其一人之身的大中华地理志编修事业戛然而止。

中国地学会汇集众手，以林传甲为总纂，计划以10年之期，编修集国家、省、县于一体的大中华地理志，作为各级学校的乡土地理教科书，在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外，复能为政治、实业等各界提供参考，助益民政与实业。又期望各分志书之能树立地方自治的根基，合之能维系共和统一。然而承诺编修大中华地理志的大多是国会议员，政局的变幻使这些承诺大都成空。虽有林传甲以一己之力勉强支撑，但限于能力，国家志未能开编，省志完成10余种，县志修成的数量虽难以统计，然所成者当百不及一。至于大中华地理志以成为各级学校的教科书为目标，顾颉刚在1923年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周越然编英文教科，以抽版税故，每年可入八千元。此事予总想效法，以予欲赚钱，舍此无他道也。”^⑥可以作为一解。

(作者单位：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)

本文责编：詹利萍

① 林传甲：《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自序》，林传甲总纂、林传涛分纂：《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》，第2页。

② 陈宝泉：《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序》，《地学杂志》1920年第10期，1920年10月25日。

③ 参见《大中华地理志十二编》，《地学杂志》1920年第10期，1920年10月25日。

④ 《内务部批第六九〇号：原具呈人林传甲呈一件：呈送所著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清注册给照由》，《政府公报》第1657号，1920年9月24日。

⑤ 林传甲：《大中华吉林省地理志自序》，《大中华吉林省地理志》，吉东印刷厅，1921年，第6页。

⑥ 顾颉刚：《顾颉刚日记》，中华书局，2011年，第1卷，第311页。